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

企业发展中的
制度变迁

主编 张忠民 陆兴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NSTITUTE
IN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

企业发展中的 制度变迁

主编 张忠民 陆兴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张忠民,陆兴龙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ISBN 7-80681-280-6

I.企... II.①张...②陆 III.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文集 IV.F2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966 号

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作 者 张忠民 陆兴龙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邹 简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412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ISBN 7-80681-280-6/K·065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企业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极为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市场中独立进行生产和交换的主体,是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单元;由若干生产或经营内容相同的企业的集合形成的不同类型的工商行业,是介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实体。企业与行业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共同发展与衰退是一个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世纪中期,近代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的开办,昭示着当时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开端,而随着新式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工商业行业,真实地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的水准。因此,长期以来,从事中国经济史工作的学者们都十分重视对企业史和行业史的研究。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以沙海淘金的精神,从浩如烟海的历史积淀中发掘出一批企业和行业的相关资料,先后加以整理出版。在此基础上,又有许多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研究的学者,继续推进有关企业史和行业史的学术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关这些方面的优秀论文,出版了许多见识卓越的专著,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从而使企业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学中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

近年来,对企业史的学术研究更是有了可喜的进步,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切入企业的内涵,探讨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制度、商事习惯、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等深层次的问题,并对企业史的研究进一步向企业的外部环境、城市间经济联系等方面延伸。在企业史的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化的特色,包括比较研究、数量分析、国外新的研究理论引进等都有所运用。运用新方法、具有新观点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促进了企业史研究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同时,学术研究者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展,不仅国内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中出现了不少从事企业史研究的新人,而且海外学者也对中国企业史研究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学者频频来上海社会科学院访问,与中国学者进行有关学术交流。从20世纪80年

2 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代以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多次举办过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研讨会,在历届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企业史的学术交流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始终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特别是我院成立了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后,与国内外学者之间的互访更加频繁,前后有数十位学者到中心来查阅有关企业的档案,并与中心建立了长久的学术协作关系。来访的学者们都或多或少表示,希望能够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召开一次有关企业史方面的专题研讨会。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支持,最终促成了2002年8月的这次学术盛会。

这次会议有三个主题,分别是企业制度、企业家精神和城市经济联系。前两个主题很明显是与讨论企业发展有着直接关系的,第三个主题则是针对讨论企业外部发展环境而设立的,也与企业发展休戚相关。因此,可以说,三个主题完全是有机统一的,是从三个不同的方位,对近代中国企业发展因素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由于会议主题设计紧凑,安排合理,加上与会学者事前都进行了精心准备,人人都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提交的论文内容集中、观点鲜明,在方法论上又各有建树,许多论文都有很高的质量。在研讨会上,各种意见得到了充分论述,有些观点的交锋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会下又进行相互切磋,取长补短,会后再次吸收有关意见进行推敲修正,最后汇编成此书,使会议取得的成果能够长期保存,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和繁荣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作出贡献,我谨藉此文向会议的组织和本书的编辑者表示祝贺,并向与会的海内外学者,上海市与本院的学者,我们的老朋友和新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张仲礼

2003年6月

前言：关注学科前沿、回应时代挑战， 在比较中迈向经济史研究的国际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忠民 陆兴龙

2002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会同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上海市档案研究中心在沪举办了《企业制度·企业家精神·城市经济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以及香港、北京、上海、天津、厦门、苏州等地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书所收录的就是与会学者在会后根据讨论意见作了不同程度修改的论文。这些论文在理论上回应时代挑战，在选题上关注学科前沿，在方法上推陈出新；实证研究中无不透现出个性化的研究特色以及现实性的价值取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国内外经济史学界对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中制度变迁以及相关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企业史与企业制度研究的某种发展趋向。

本书共收录论文29篇，按照内容相关程度大致上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的两项主题报告。报告者一位是国内的前辈学者，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张仲礼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回顾过去一项重要的研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理论思考；另一位是美国康乃尔大学著名的中国企业史学家高家龙教授，主题是从其已经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出发，提出了中国企业史研究面临的三大挑战。第二部分是制度研究，它们包括企业制度、公司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商事制度研究，相应的内容涉及股份制问题、公司制度问题、国有企业股份减持问题、商事制度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第三部分是关于企业史与企业家的个案研究，所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和银行业两大行业之中，其中美国学者梅爱莲等的文章还作了极有创新意义的中外企业的个案比较研究；第四部分是企业外部环境与城市经济联系，由于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内容本来就包括了“城市经济联系”，因此诸如上海、天津、苏州，以及长江三角洲

等近代中国企业相对集中的城市与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等问题自然就成为相当一部分论文关注和讨论的对象;第五部分是关于研究动态、研究现状与研究资料的一些翔实和有意义的介绍。

一、回应时代挑战、促进理论创新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企业史一直是众多海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美国学者高家龙多年来一直从事近代中国企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2000年,高家龙出版了他最新的英文著作“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1880~1937)”(《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 188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著作出版以后,高家龙开始进一步思考他在书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高家龙的主题报告即以他的新著《大公司与关系网》为据,提出了中国企业史研究所面临的三大挑战:这就是,如何将长途贸易的研究理论化?如何综合研究中国企业史和中国政治史?以及如何解释在商业组织中中国社会关系网的活力而不过度夸大它的作用?

高家龙认为,对中国近代长途贸易的研究需要建立新的理论,应将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看作文化中介人,应该显示出这些文化中介人如何解释和弥合中外文化、中国各大区域内市场等级制中不同层次文化上的差异,应该能够表达长途贸易中人的作用的本质;而对于如何综合研究中国企业史和中国政治史,高家龙提出要创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重新解释当时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至于如何解释在商业组织中中国社会关系网的活力而不过度夸大它的作用,高家龙的观点是当时中国赢利的大公司都同时依靠了社会关系网和公司层级管理结构,因而每家企业都产生了社会关系网和企业层级结构之间的动态互动。这三种挑战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但每一种都各有自己独立的研究价值。它们同时涉及的都是企业史研究中的综合环境问题。

综合这三大挑战,可以看出,它们都与近年来中外学者所热切关注的企业史研究中的人际关系网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深层次的含义不仅涉及到对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中国特色问题的诠释,而且所涵盖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纯经济史的研究。高家龙教授“三个挑战”的提出再次拓展了人际关系网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人际关系网的研究很可能会循

沿“理论界定”以及“时空比较”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展开。诸如“人际关系网”与“社会关系网”的提法有何不同,它们各自的内涵与外延在理论上应该如何进一步界定和描述,关系网(network)的定义以及中英文翻译中的用词和内涵的界定性问题等等。除了理论上的界定和讨论外,随着考虑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关系网的研究还需要更大量细致、分门别类、不同层面的具体的实证性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际关系网是否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社会关系网是否有什么不同,不同地区如上海企业的社会关系网与北京、天津、厦门的企业关系网有什么不同,海外华侨关系网与中国地方关系网的联系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学者今后的研究留下了极大的探索空间。

张仲礼教授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以其成名作《中国绅士》以及《中国绅士的收入》而蜚声中外经济史学术界。以后,张仲礼又以极大的精力开始了对近代中国外资企业的深入研究。在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中,他又提出了在新的形势、新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历史上在华外资大企业性质、制度等具有现实意义的新命题。这些问题包括:旧中国外资大企业是不是跨国公司的问题,旧中国外资在华大企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问题,旧中国外资大企业的集资、融资问题,以及旧中国外资大企业的优化高层人才策略问题。从如何正确把握跨国公司的理论内涵出发,张仲礼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活动的起始年代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活跃于近代中国早期的太古洋行、沙逊洋行以及英美烟公司等外资企业,当时已经以企业集团或托拉斯经济组织形式存在于母国、中国和第三国,它们的经营活动属于早期跨国公司的范畴。据此可以认定,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活动的研究,在起始时间上应当向前推进到上个世纪初期。从历史研究出发,张仲礼最后认为,21 世纪是中国自身的大企业以跨国公司的面貌走出去,占据世界大市场一席之地的大好时期,而对于近代中国大企业的组织和管理制度、集资和融资办法、优化高层人才策略等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促进当代中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

张仲礼教授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于经济史研究中的传统领域以及传统课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社会需求以及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创新以及研究的深度上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做出有创意的崭新的学术成果,这确实是值得每一个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外学者认真思考的。从这一点上说,张仲礼论文的学术创新涵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论文所直接论述的内容本身。

二、关注学科前沿、深化企业制度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以来,在当代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的大背景下,有关企业制度以及公司制度变迁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研究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本书收录的论文中,有关企业制度、公司制度、商事制度的研究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朱荫贵的论文对企业制度(包括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并以近代企业中的“官利”制度和融资方式为具体实例,论证了中国在近代之初从西方引进股份制企业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伊始,其中就已经包含或者说是结合了前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形和无形的经济制度,而且这种中西结合的企业制度在整个近代中国大历史时期内始终得以存在和延续。这种企业制度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是由于近代中国制度生成的环境不良、法规建设滞后,以及在这两者缺陷影响下的交易成本制约所产生的。

王玉茹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别从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制度背景以及企业产生、运行的市场环境出发,对中日两国近代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两国近代公司制度,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产生和发展所面临的不同的市场环境,形成了两国近代企业制度发展不同的命运,并且最终导致了两国经济近代化不同的结果。其报告中涉及的私有制与私有产权的属性,以及认定其确立的界标问题值得引起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在近代中国的企业制度变迁中,国有企业是如何进行股份售让和减持的,在以往的经济史、企业史研究中鲜有波及。张忠民的论文探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政府对部分国有企业实施国有股份减持的曲折历程,提出当时的国有资本从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逐步退出,以股份售让形式向民营方向转变,符合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南京政府以财政为中心的减持目的,以及减持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减持时机的多次延误,最终使国有股份减持完全失败。论文虽然只是对 50 多年前国有企业国有股份减持的历史事件进行剖析,但其中却透现出强烈的现实需求背景。

施正康论文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考察是从当时国人对公司制度认识和实践的角度进行的。认为西方公司制度输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社

会认识、理解、接受和整合的过程,并非是对原有制度一成不变的复制,而是加入了中国社会原来固有的许多成分,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思维、经验、价值观去判断、取舍、改造的过程,结果是演绎出一个不完全相同于西方公司制度的发展过程。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别能够使后来的发展结果大相径庭,从中所显示出的是中国近代社会中传统成分根深蒂固的力量。

如果说上述四篇论文主要是集中在对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公司制度的研究。那么日本学者久保亨的研究,则把着眼点转向了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的“周边因素”。所谓周边因素指的是,近代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企业是由华侨或者留学生参与创办经营的,而这些华侨、留学生是从中国社会内部走向外部存在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在中国社会的中心,而是在周边,这就产生了“周边因素”,而这些由华侨和留学生等与外国经济势力有不同联系的经营者所创办的企业就可以界定为“周边因素企业”。他认为,周边因素企业是既非外国经济势力设立的企业,亦非中国内在经济势力设立的企业,而是进入到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却又离外部世界最近的即所谓周边性的存在的企业。周边因素企业正因为其特殊的地位,因此深具自身优势而容易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由于在迄今为止的近代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周边因素”以及“周边因素企业”的提法完全是一种新的诠释与分析,因此在讨论中,与会学者自然把注意的焦点首先集中到了“周边因素”以及“周边因素企业”的界定上。不少学者认为,即使是在对“周边因素”以及“周边因素企业”进行了较为合理的理论界定之后,还要有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具体分析,同时还应有与非周边因素企业的比较分析。更进一步说,将周边因素引进近代中国企业史研究,还会引发对传统企业发展理论的诸多反思,其中所体现的考察问题的思路以及探究精神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思。

戴一峰的文章从地域社会及制度变迁的视野切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东南亚华人移民所建构的环南中国海跨国社会空间范围内,考察了侨批局制度建构的基本特征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特点。他认为,侨批局是借助侨民的社会纽带,将自身网络化,并使其商业活动结构性地嵌入于华人跨国社会。这种嵌入显然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已注意到的许多华人企业对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而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嵌入,因为它是以一种网络形态,整体性地嵌入华人跨国社会的。它不同于其他一般“联合企业”、“关系企业”、“连锁企业”等网络型企业,而是和其他各种华人网络交织着一道嵌入于华人跨国社会空间的。

应该说,在如何运用现代企业理论、社会学理论分析传统中国企业制度方面,戴一峰的研究是颇具创意的。

在近代中国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商事制度的研究向来薄弱。刘兰兮的论文从传统因素与外来因素的比较研究着手,从商业贸易中的习惯法与成文法切入,探讨了近代中国商业贸易,特别是中外贸易中传统商事习惯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当西方的司法思想和司法体系进入中国以后,朝野各方都曾经试以照搬西方,但是与现实的商业贸易习惯屡有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有关方面才被迫去搞“商业习惯调查”,花了许多力气,力图建立一个中西结合、成文法与习惯法结合的中西合璧的司法体系。由此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在西方势力以及西方文化进入后的近代中国商业活动中,传统习惯势力究竟在经济发展中还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地位和作用;即使是在当今的条件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看待这种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互动以及冲撞。

从以上诸论文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公司制度、商事制度的研究可能会顺沿这样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一是关于一些重要范畴和概念的理论界定和探讨。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不是十分深入的,或者说是开展得并不是十分充分的。实际上,在以往不少的学术争论中,有许多歧义或者说论战往往是在论域不确定,或者是论争双方所持范畴、概念理解或界定不一的状况下进行的。因此,如何从规范学术讨论的基本范式入手,对诸如企业制度、股份制、公司制、合伙制、近代企业等等重要范畴和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具体、深入的探讨与必要的理论界定,以求研究的深化和规范,是十分必要并且有着极大的研究余地的。

二是对于企业制度、公司制度演进和变迁各个阶段、各种问题的具体研究以及互相之间的比较研究,如对家族企业制度、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企业集团、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制等,都将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在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怎样看待和解释企业制度的特征、地位以及互相之间的联系,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制度安排、治理结构等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不能机械地、不加区分地笼统认为只有大的才是好的,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才是好的;在注重研究上海等工商大都会城市的企业与企业制度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中小企业的制度安排和变迁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深化企业制度研究重要和有价值的方面。

三是在近代中国企业制度的形成、演进过程中,如何看待外来的西方企业制度与中国传统企业制度的关系,如何看待和进一步开展中外企业制度演化、变迁的异同比较等等,这不仅涉及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同时也是揭示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中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在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中,它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

三、在比较中拓展企业史与企业家精神研究

企业史以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一直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企业史与企业家精神的个案研究,比较研究无疑是一种较为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

美国学者梅爱莲的论文将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刘鸿生企业与历史上的英国股份公司以及当今美国的安然公司做了极具特色的比较研究。梅爱莲认为,当今美国的跨国大公司——安然公司宣告破产申请的事件提供了重新认识当年中国资本家某些经营手法的一个极好契机。她在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认为,安然集团与刘氏集团尽管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各自动因不同,但是在广泛组建合营公司和股份公司,为各自企业的私利而制造假账、虚报公司业绩、自己给自己贷款,以及为企业营建关系网等方面都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并且进一步引申出,只有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十分推崇和注重的方法。企业史的比较研究包括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外企业的比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比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的比较,以及传统因素与外来因素的比较等等。梅爱莲的论文可以说是在企业史个案比较研究方面的又一个有益尝试。

美国学者关文斌以永久黄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为例,对近代中国企业家利用社会关系网从事企业经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永利制碱企业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卜内门,如果没有良好的上层社会关系,是很难创办起来的。企业创办以后,尽管企业创办人范旭东认为与军阀官僚打交道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但仍然一直与北京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企业又将上层关系网转移到了南方。企业家在政界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活动无疑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关键的作

用。从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在近代中国的某些企业和企业家中,那种得以超越钱德勒式的仅有技术、管理和内部组织的企业史,看到企业家的社会政治关系网及其“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美国学者柯丽莎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张謇以及大生企业集团经营活动的考察。柯丽莎认为,张謇通过账房对大生的管理和财务进行权威而娴熟的控制,把家庭企业的特点和公司的特点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企业制度。大生尽管事实上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但由于个人控制加上职责不明晰,使得张謇事实上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中心。1926年张謇死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被国有化,大生这样一家现代企业的发展史为企业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由个人高度控制的企业逐渐向由现代银行和政府机构控制企业转型的十分有意义的案例。在讨论中也有学者提出,张謇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利用现代企业制度,家族人才也没有很好地培养。另外如何从实际出发对家族企业与现代公司进行理论上的界定,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赵津以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亚公司)的经营管理为例,研究了“以人为本”的民族企业文化。她认为,企业文化的理论是西方人从日本企业成功的经验中总结出来,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受到中国企业家和学者关注。然而,早在70年前就蜚声全国的著名企业——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依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而取得极大成功。东亚公司“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包括以人为本的品牌经营,以人为本的经营战略,以及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这是一种将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与中国儒学思想相结合的“东亚企业文化”。追寻中国企业文化之源,体现中西结合特色的“东亚企业文化”,即便与当今世界著名的“松下精神”、“丰田精神”、“IBM文化”相比,也毫不逊色。它不仅证实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发源,也展示了近代中国企业家在企业文化管理方面的贡献。

陈正卿的研究以上海市档案馆所藏“天字号”企业档案为据,对近代上海著名的天字号化工企业,以及企业创建人吴蕴初的企业活动和吴蕴初的企业家精神风貌进行了考察。认为,吴蕴初创设的天字号企业已经具备了企业集团的雏形,吴蕴初的企业家精神风貌在当时的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近代中国企业家中的佼佼者。朱婷的研究则探讨了战后最主要的国有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人事制度,分析了中纺公司上层领导经营理念上的

进取精神,以及管理方法上的务实态度。江满情的论文则以刘鸿生企业档案为据,讲述了刘鸿生企业的产销联营问题。

在本书收录的有关企业史和企业家个案研究的论文中,关于金融企业以及金融企业家的研究是十分具有研究功力和研究特色的。

美国学者柯博文关于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论文分析了大银行家周作民在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如何巧妙地利用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网,游刃有余地与之周旋,保持企业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发展。他认为,周作民是近代中国生活和事业均受战乱冲击的几个著名的银行家之一。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周作民和其他一些人就已经成为发展中国近代私营银行的开拓者。到30年代末期,由于蒋介石政府加强对银行业的控制,私营银行的独立性已大大削弱。但是论对私营银行的打击之深,则莫过于战争。不管是对国家的经济抑或对私营银行家的个人生活而言,战争都称得上是灭顶之灾。最后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国大陆所有的银行都收归国有,近代中国私营银行的黄金时代就此宣告终结。

马长林的论文探讨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放款机制,认为在社会经济经常出现波动,金融风险时有发生民国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所以有可观的经营业绩,同其严密的放款制度和健全的放款决策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科学严密的放款机制的形成,是其多年来面对银行的经营对象和生存环境,审时度势,努力建设的结果,既充分体现了该金融企业同其他同行与众不同的经营特色,也为它在充满风险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在金融行业的激烈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并一直遥遥领先,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保证。

杨天亮关于胡笔江与中南银行的论文展示了近代中国著名银行家胡笔江诚信、稳慎、敬业的成功之路。认为胡笔江入主中南银行17年,以其注重信誉的诚心、稳慎的经营作风以及敬业精神,并结合他的非凡的金融才能,缔造了一个成功的中南银行;而中南银行又为胡笔江由一平民之子而成就为“稳健缜密之金融领袖”提供了展现其金融才华和个人魅力的不寻常舞台。

李一翔的论文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法实业银行停业风波这样一个发人深醒的故事。从中反映出,在近代中国金融业曲折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包括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得以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金融风潮也频繁发生。在风波中,当事各方态度、行动各有差异,是

因为他们各持的立场和代表的利益不同所决定的,由此而折射出国内银行业、政府和外方三者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京津沪汉银行界在处置突发事件中的密切合作与协调,也说明全国四大金融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步加强,并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

上述这些关于金融企业以及金融企业家的研究文章显示了有关金融史的研究正在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企业史研究中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企业外部环境 with 城市经济联系的探索

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与所在城市或周边城市的经济关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而企业外部环境 with 城市经济联系本身也是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中有一部分就是分别从区域经济理论,以及城市学、城市社会学等角度,对近代中国企业比较集中的上海、天津、苏州以及长江三角洲的企业与城市、城镇间的经济联系和关系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讨论。

戴鞍钢的论文讨论了清末民初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的经济联系。他认为,近代上海的崛起促使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城市由苏州向上海的转移,原先以苏州为中心、以运河为纽带的城镇体系转而归向上海。这些城镇的商品流通结构也从原来面向国内市场的粮棉产品交换逐步转化为纳入国际市场的以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产品间的交换为主。长江三角洲城镇体系的这种深刻变化,即由内向型朝外向型的逐步转变,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使长三角地区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而推动了长三角地区城镇经济结构的演化,并成为日后无锡、常州、镇江等与上海相呼应的苏南近代城市链兴起的先声。

陆兴龙的论文讨论了近代上海工业与城市发展的联系。他提出,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拓展是由于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所引起的,工业生产是近代上海城市功能中最重要的主导功能,上海也因此而成为全国的制造业中心和特大型城市。在讨论中也有学者对文中所提到的“到19世纪30年代左右,上海城市人口总体上已经属于生产性人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即使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也大于工业的就业人口。

贺水金关于工业化初期上海外资企业对民族企业示范效应的论文,

虽然所据资料基本上引自学界所熟知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但所论及的题目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涵义。她认为，综观近代中国的新兴行业企业，大多由外资企业始创于上海，民族企业仿效于后，进而向全国扩散，形成上海学外企，外地学上海的独特的学习、辐射、传承链条。外资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合中国国情，一般都有一个中国化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较之于照搬外国模式，适用性更强，见效更快，这也许是近代中国引进外资，付出昂贵代价后所获得的一大收获。

樊卫国的论文从近代上海的人文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入手，认为近代上海社会的人文环境具有多元化、异质性的特点。上海的人文环境与上海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具有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近代上海急速的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铸就了近代上海兼容创新、趋势多变的文化性格和人文环境，而人文环境作为外部条件又影响着上海企业的经营；企业的兴衰，经营的成败所蕴藉的思想理念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从中所透现出的是，在当今关于经济史、企业史的研究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运用人文精神、人本主义的方法来探索和解读各种经济历史现象。

在近年来的企业史研究中，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科技因素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宋美云以天津近代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现代化为题，认为天津近代企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在一批新式企业家的领导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克服外部不利因素，在艰难困境中奋发图强，推行技术进步，塑造了一批具有先进企业文化的经营典型。天津企业的技术进步有力地推动了天津近代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对此展开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提出不同地区（如上海、天津）、不同类型（如大企业、中小企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应该有其各自的特点，对此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和揭示；另外，在论及企业技术进步创造企业的经济效应时，如果能够提供具有实证意义的科技因素对企业经济效应贡献率的量化分析，其结果将更具有说服力。

单强的论文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江南区域经济中心地转移中，苏州与上海扮演的区域发展极的角色问题。认为在古代的明清时期，是“大苏州”与“小上海”的苏州中心时代，在近代百年时期，是“小苏州”与“大上海”的上海中心时代，而在当今的现代格局时期，则应该是大上海区域一体化时代。在大上海区域一体化时代，苏州城市化应重新定位，以便形成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五、理论史料并重、推进经济史研究的国际化

近年来,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一个明显的学术趋向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学科、跨学科渗透,其中有关经济中介组织的“第三域”理论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与社会关系网有类似之处的是,在企业制度研究的外部环境方面,陈争平提出了引进西方以“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第三域”(又称第三部门)理论,与近代中国社团,特别是有关近代商会、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研究相结合的问题。但在讨论中也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不一样,近代中国的情况更是与当代西方“第三域”理论抽象的社会背景不一样。如果引进第三域的理论分析工具,那么如何界定和区分第三域的分类与层次,第三域中一般的社会团体与工商业经济团体的区别如何,都是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还有学者提出,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第三域的发展往往同政府的发展同步,而近代中国的第三域(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此强彼弱,反之亦然。总的来说,第三域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既有矛盾,又有合作。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讨论的。

香港学者李培德多年来一直关注和从事香港的企业史研究,他所递交的论文《近年来香港企业史研究》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李培德认为,过去有关香港企业史的研究,注意力多集中在成功的企业家和知名企业,且研究动机不是为企业家和企业宣传,就是为找出企业家和企业的“发迹故事”、“成功之道”。因而各类性质的所谓“企业家传”和纯粹商业用途的“企业集团史”相继推出,这样容易使人对严谨的学术研究产生误解。其实,直至今日,还有不少重要的研究课题无人问津,例如: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对企业施行的政策,企业家的政治立场,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精神,企业的管理、财务、市场史等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开拓。另外,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只重视文字材料,而完全忽略视觉艺术资料的重要性,例如企业的广告和商标,其实这些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并使人重新思考过去并没有充分注意的问题,以至做出崭新的研究成果。

在这次研讨会上,通过对递交论文的充分讨论,与会中外学者普遍感觉到经济史、企业史的研究一是要重视史料,二是要重视理论。在重视史料方面,档案资料以及档案馆的作用极为重要。在这方面,黄汉民代表上